

IN PRAISE OF DOUBT

疑之颂

如何信而不狂

HOW TO HAVE CONVICTIONS
WITHOUT BECOMING A FANATIC



[美] 彼得·伯格 [荷] 安东·泽德瓦尔德 著

曹义昆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PRAISE
OF DOUBT

疑之颂

如何信而不狂

HOW TO HAVE CONVICTIONS
WITHOUT BECOMING A FANATIC

[美] 彼得·伯格 [荷] 安东·泽德瓦尔德 著

曹义昆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 / (美) 伯格, (荷) 泽德瓦尔德著;
曹义昆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542-6

I. ①疑… II. ①伯… ②泽… ③曹… III. ①道德—
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5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

〔美〕伯格

〔荷〕泽德瓦尔德 著

曹义昆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542-6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25

定价：30.00 元

目 录

致 谢	001
第一章 现代性的诸神	001
第二章 相对化的态势	025
第三章 相对主义	049
第四章 基要主义	069
第五章 确定性和怀疑	088
第六章 怀疑的界限	118
第七章 中庸政治	142
索引	162

第一章 现代性的诸神

在 20 世纪的黎明时分即将来临之际,尼采曾以饱含激情的绝对语调宣布上帝之死。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预言似乎并不合理。在宇宙现实中,上帝是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并且,经验科学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上帝不能成为实验的对象。但是今天,在经验可以通达的人类生活的实存领域,却的确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神灵,它们彼此竞争,以吸引人们的专注和忠诚。尼采曾认为,他站在一个无神论世纪的起点。现在看来,21 世纪反倒是被打上了多神论的烙印,恰似许多古老的神灵携着仇恨卷土重来。

1

启蒙时期一些较为激进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法国,以欢快的期盼情绪预言宗教消亡。宗教被认为是一种大虚幻,不但引生了大量的迷信,而且也招致了滔天的暴虐。欧洲新教分立后接踵而来的宗教战争给这一观点增加了可信度。故而,伏尔泰喊出的“消灭臭名昭著者”,不但针对天主教会——以他的经历,乃是万恶之源——而且针对一般的宗教。新教继续处死异端、烧死“妖魅惑众”者,其热情较之它的天主教对手毫不逊色。

2

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外,同样不能找到更具吸引力的宗教传统。

借以摧毁宗教的工具当然是理性。在理性的冷峻光芒照耀下,宗教的种种虚幻将会隐退。当法国革命在巴黎的玛德琳教堂(Church of the Madeleine)加冕理性女神时,这一期愿被戏剧般地予以象征化。启蒙时代的这类信念并未随着法国革命的结束而结束,实际上它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19世纪,这种信仰特别倚重于科学。人们认为,理性将为理解世界并最终构建起一种道德上优越的社会秩序找到一种准确无误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启蒙哲学已演变成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这一演变的先知乃是奥古斯特·孔德,其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欧洲及其之外的进步知识阶层有过巨大的影响(特别在拉美,巴西的国旗依然纹饰着孔德的口号“秩序和进步”)。正是由孔德创立了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并非如此偶然。

3 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它与孔德心目中的内容已具有越来越少的相似性。它不只是将自身视为哲学系统,而且日益视为建基于经验证据并诉诸经验证伪的一门科学。三位思想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以及马克斯·韦伯。在这三者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一旦涉及宗教,尽管基于不同的理由,每一位都相信现代性导致其平穩式微。马克思和涂尔干是启蒙运动的产儿,对这一所谓的进展表示欢迎。而韦伯,则以忧郁式的顺从态度对此加以沉思。

在 20 世纪发展出来的宗教社会学领域,把现代性和宗教的式微相关联的,以“世俗化理论”而著称。这一理论主张:现代性,同时因为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现代制度对宗教信仰的社会基础的削弱,必然会导致世俗化的出现(被理解为宗教在社会以及个体头脑中的渐次衰落)。这一看法不是基于对宗教的哲学式摒弃,而是建立在似乎支持它的各种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重要的是,许多这样的材料来自欧洲)。应该强调,这一理论乃是“价值中立”(用韦伯的一个术语)。也就是说,它同时可以被那些对它表示欢迎和满怀忧伤的人们所坚持。故而,20 世纪有好些基督教神学家对这一所谓的世俗化进程远非乐而观之,但却把它看作是一种科学建立起来的事实而加以接受,认为教会和个体信仰者都必须对此达成妥协。有些神学家则找到了实际上拥护它的方式(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短暂流行的“上帝之死神学”的倡导者——“人咬狗”式奇闻的绝佳范例)。

世界上目前世俗化的状况如何?

说世俗化理论被二战以来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大规模证伪是公允的(这正是为什么除极少数人坚持外,大多数宗教社会学家已经改变了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放眼当今世界,人们所见到的不是世俗化,而是各种激情澎湃的宗教运动的大规模爆发。出于明显的理由,人们大多注意到伊斯兰教的复兴。那些好斗的圣战

倡导者固然引人瞩目,但他们仅是要大得多的社会现象小量的(尽管很令人不安)组成成分而已。遍及广袤的穆斯林世界——从北非到东南亚,以及西方的穆斯林聚居区——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指望着伊斯兰教给他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和指引,而这一现象大部分和政治并无瓜葛。

可以说,一种甚至更加蔚为壮观的发展乃是福音派新教尤其是以五旬节派的版本形式的全球性扩张。1906年,一场复兴运动——所谓的“阿苏萨大街复兴”(Azusa Street Revival)——在洛杉矶发生。这场运动由一位魅力超凡的黑人牧师领导,他火热的布道迅速建立起一个跨越种族的信众。不久,该信众的成员开始“讲异语”(五旬节信仰的确定性标志)。当来自阿苏萨的传教士遍及整个的美国以及海外时,该信仰引生了许多不断增长的教派。但五旬节信仰最具戏剧性的全球扩张则出现在二战以后——在拉美、非洲以及亚洲的各地。现在,估计全世界大约有4亿五旬节派教徒。这肯定是历史上所有宗教运动中最为快速的发展。除正常的五旬节派教会机构的壮大外,也存在所谓的“五旬节派化”——也就是说,在各种新教甚至天主教会中,具有神赐超凡能力的“讲异语”、医治以及其他“灵恩”形式的增长。五旬节信仰也不是全球扩展的福音派新教唯一的形式。据估计,有大约10万名福音传教士活跃在世界各地——许多来自美国,其他则来自拉美、非洲、韩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同时,也有“大众新教”的广义范畴——指那些一般不被认为是新教但其宗教和社会特

征带有新教风格的群体。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摩门教徒，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已得到迅速增长。

天主教会(可以说是最为古老的全球性机构)在它的欧洲老家已是举步维艰,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依然朝气蓬勃。这同样适用于一些源自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包括著名的圣公会,它在英国已极度边缘化,但在非洲却很成功。东正教在遭受共产主义政权多年迫害后,现在也经历着一场真正的复苏,尤其在俄罗斯。

事实上,其他各大宗教传统都可以说是如此。正统派犹太教在美国和以色列得到发展。已经有印度教的复兴,对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世俗界定发出挑战。有强劲的佛教复兴运动,他们中的一些正在西方国家开展传教工作。在日本,已能见到很多强有力的宗教运动,其中有佛教、基督教以及神道教的合成品提供。儒教同时作为宗教和伦理的学说,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圈里已被重新发现。

6

在这幅热闹的宗教世界画卷之外,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地理上的——中西欧。作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地域,世俗化理论在那里看上去很合理。另一个则是社会学上的——在整个人口中为数不多但却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全球性的世俗主义。在此不可能对造成这些例外的种种缘由加以详细论述。然而,为避免肤浅概括,我们需要强调,这两种情形都很复杂。尽管西欧(同时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和教会相关的宗教虔信有一个大的滑落,但在教会之外,从不同形式的新世纪灵性运动(New Age spirituality)

到灵恩运动 (chrismatic movement), 各种类型的宗教活动都能观察得到。此外, 中世纪早期强势存在于欧洲数百年的伊斯兰教之再度临现, 导致了对被大肆吹捧的“所谓欧洲价值观”(European values) 是否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类问题的全新论辩。就世俗知识分子这一层面而论, 这一阶层已经存在着强劲的宗教复苏, 特别是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故而, 突然转变为这样或那样的武力宗教运动的追随者的, 往往是接受过高度世俗化知识教育的那些人。

总而言之: 现代性必然会导致宗教的式微,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观点。激进的启蒙运动的一些晚近儿孙(各地依然有一些)或许觉得会是这样。但很不幸, 并非如此。如果现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世俗化(除了在瑞典和德里大学的教工俱乐部外), 那么在信仰和价值领域它带来了什么? 我们认为, 答案很明显: 带来了多元性。

什么是多元性, 它对于个体和社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以“多元性”(plurality)意指各式各样的人群(种族的、宗教的或不论何种区别的)在文明和睦以及彼此社会交往的条件下居住在一起的一种情形。导致这一情形的过程, 我们将称之为“多元化”(pluralization)。那么, 我们在这里的论点可以简洁地表述为: 现代性使之多元化。

尽管这一定义很简单, 它所指涉的事务之经验状态

却高度地复杂。在以上我们试图对它解释之前,存在一个术语知识点:我们称之为“多元性”的情形更普遍地被称为“多元主义”(pluralism)。我们避开这一用语,是因为后缀“ism”表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指(我们意欲传达的)一种经验上可能的社会现实。并且,正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主义”一词才第一次出现。据我们所知,这个词是由美国教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20世纪20年代所创造,而且是为了颂扬美国社会的多样性。这样思考“多元性”/“多元主义”之间的区别:如果“多元性”指的是一种社会现实(人们可以欢呼或者悲悼的现实),“多元主义”就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扩展为对这一现实表示欢迎的成熟哲学。这种术语的澄清工作有助于使我们的论点一开始就反对我们早些时候所摒弃的那种主张现代性使之世俗化的论点。同样,“世俗性”以及导向它的“世俗化过程”皆是指经验上可以探究和(在本书的讨论场合中)加以证伪的关于社会现实的概念,且像多元性一样,人们可以对其欢呼或满怀忧伤。存在一个长久的肇始于启蒙时代的传统,被合理地称作“世俗主义”,对世俗化表示欢迎,以至于相信它已经发生,沉迷于它必将并且应该取得成功的未来憧憬之中。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有机会回到世俗主义这一话题。

8

回到我们对“多元性”的定义: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构成社会的各种群体的多样性。但我们的定义包括两个更深层的因素——文明和睦以及社会交往。这些是重要的。一个社会当然可以有多样性,但不文明和睦——

不同的群体卷入暴力冲突,可能以一个群体压迫、奴役甚至灭绝其他群体而走向极致。这样的情形下谈论“多元性”毫无意义。如其不然,就是多样的群体相互并存但不交往——相安无事,或者说彼此不说话。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里所着眼的多元化动力的独特过程也将不会发生。第一种情形的例子乃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黑人和白人作为奴隶主和奴隶共存。第二种情形的例子乃是传统的印度社会,以严格避免彼此间社会交往的种姓制度组织起来(依照共餐和通婚禁忌——禁止与群体之外的人们一起进食和结婚——这在阻止交往方面很有效)。

9

现代性使之多元化的理由很好理解: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类生活在具有以极高程度的认知和规范共识为特征的社群之中——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持有世界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其中行动的共同看法。当然,经常也有边缘性类型,即那些对理所当然的看法进行质疑的人们,譬如说苏格拉底。但这样的个体很少。换言之,在各行其道的不同的群体之间,没有过多的对话和交流。社会隔离的壁垒很高。

现代性以其日益增长的速度和范围,削弱了这些壁垒。它导致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比例,许多城市规模庞大,而且城市已成为不同的群体不断摩肩接踵地经常照面的地方。随着世界范围的城市化、“都市风格”(urbanity)的传播和蔓延,一种城市的/都市的(urban/urbane)文化由多元性所滋养,这种文化又反哺多元性。此外,又有跨越广袤地域的大规模人员流动,带来了形

形形色色的群体彼此间亲密的接触。大众教育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所觉醒和认识。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的大众传媒手段——电影、广播、电视、电话以及计算机革命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导致人们在以其他的文化路径理解和对待生活现实的能力方面得到巨大提升。作为现代性所特有的这些过程的一个结果,多元性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度。

当然,多元的情形在过去也有过。在中亚,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多个世纪享受着一种真正的多元性,特别是不同的宗教传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基督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儒教。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类似的多元情形盛行于印度的莫卧儿王朝、霍亨斯陶芬王室统治的西西里岛以及穆斯林时期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在那里,*convivencia*[共存]的观念乃是一种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早期表达形式)。对西方文明史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后期与现代多元性的境况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尤其通过宗教多样性体现出来。置身于如此特定的背景之中,基督教一开始就作为一种世界性大教登上历史舞台,决非偶然。但所有这些前现代的多元性情形的范围却非常有限。以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为例。那时,这座城市大概和今天人们在任何地方所能发现的社会一样地多元(尽管没有电脑和手机)。但如果当时乘一艘小船溯尼罗河而上不远的距离,就会来到和漫长的埃及历史上任何普通的村落一样文化同质的村落——或许其中的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认

为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甚至从未听说过亚历山大。而在今天,即便生态旅游的组织者们处心积虑,也极难找到堪与上述村落相比拟的文化同质的地方——很可能根本找不到文化孤立的特例。(不消说,如果他们成功地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活动毋宁使那种质朴的纯真性快速寿终正寝,而此类纯真性正是他们汲汲以求、藉以吸引顾客的东西。)

11

在真正的多元性条件下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归入到知识社会学所使用的一个范畴之下——“认知污染”(cognitive contamination)。这建立在对一个基本的人类特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如果互相交谈,时间长了,就会开始影响彼此的思考。当这类“污染”出现时,人们发现,将其他人的信仰和价值归结为堕落、疯狂或邪恶会越来越难。虽然很慢但最终肯定会不得不承认:或许这些人挺有道理。这么想时,以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现实的看法就变得动摇起来。这一出现在个体间的相互污染过程,有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充足证据,甚至在如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米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等人所开创的实验情境中也得到了再现。为此,勒温创造了“群体规范”(group norm)这一术语——任何“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过程所趋向的那种意见统一。罗克奇在他的经典研究报告《西普西兰蒂的三个基督》(*the Three Christ of Ypsilanti*)中,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子。西普西兰蒂不是指拜伦之死的希腊城镇,而是密歇根的一所精神病院。在这所医院里有三位病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

其中的一位在精神错乱中已陷得很深,不再受其他两位的影响。但罗克奇以引人入胜的细节描述了其他两位症状稍轻的病人如何就对方的基督论声言达成妥协。实际上,他们构筑了一种“合一”神学以吸纳各自的声音。

发生在个体层面的相互“污染”也发生在多个集体之间。在宗教史上,这些集体间的认知污染过程被认作是“融合”(syncretism)。一个经典事例乃是希腊的众神被罗马获取——宙斯变身朱庇特,阿佛洛狄忒变身维纳斯,等等。宗教思想(以及其他认知和规范的范畴)会从一种世界观被“转译”到另一种世界观。很明显,在这一转译过程中,它们并非总是保持不变。

除引发“认知污染”的泛滥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现代化已使科学技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存境况。这是一个范围深广的转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每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此加以描述和解析。但这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想把目光集中在这一转变的一个方面——从命运到选择的巨大转换。

12

从命运到选择的现代性转换如何影响我们?

这一转换在上述过程的核心处——技术构成部分清晰可见。想象一下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社群正在处理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使用火来温暖洞穴和烤熟作为部落主要食物的野牛肉。然后想象一下

在漫长的年代里这个社群用两块石头摩擦以产生所需要的燃烧,这种方法是他们唯一所知道的。一个现代社群在燃烧方法和能量资源方面明显有着要宽泛得多的选择余地——不同的工具,可以这么讲——更不用说有不同的食物种类可供选择。实际上,一个现代社群所拥有的选择不但体现在不同的工具之间,而且还体现在不同的技术体系方面。

13 这一选择领域的扩展不但影响到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而且体现在认知和规范的各种层次,而这正是我们在此感兴趣的焦点所在。以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例,比如说,什么是男人和女人?在前面提及的新石器时代的社群中,在这一问题上几乎不存在有任何的选择余地:对于这两种性别的性质以及随着这类被认可的性质而来的种种规范,存在着明显的具有约束力的共识。可是,在这一生活领域,现代化已极大地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系列。一般而言,一个现代的个体可以选择跟谁结婚、怎样以及在哪里组建作为婚姻结果的家庭、为支撑或接济家庭而接受什么样的职业训练、生养多少个子嗣,并且最后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养育子女。同时,也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各种完整体系——婚姻关系体系、教育体系,等等。此外,现代的个体能够选择个人的特定身份,诸如传统或革新、异性恋或同性恋、性行为自律或性开放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现代人的身份问题乃属于选择性的,是通过无数的个体而承担的某项工程(通常是终身性的)。

这对许多人来说被证明是很难的一项主张。为帮

助追求者确定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出现了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各种巨型超级市场,其中的每一家都被宣传人士和企业家(两个重叠的范畴)不遗余力地推销和兜售着。一位七十四五岁的男子给儿子写信,告知他自己的第五次婚姻,若有所思地说:“我终于发现我是谁。”(人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他将会找到一位心理治疗专家或一个力挺他的群体以证实他的这一自我评价。)一位有着亚美尼亚语名字的年轻女子和亚美尼亚并无任何的瓜葛、美国出生且只懂英语,当被问及为什么上亚美尼亚语课时,她回应道:“因为我想发现我是谁。”(同样没问题,她将会找到一个亚美尼亚教会或社群组织,这类组织对其新的身份发现表示欢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在其著作《不可融合的种族》(*Unmeltable Ethnic*)中发出惊人之语:在美国,种族性已成为一个关乎选择的事情。

14

20世纪中叶,德国社会学家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创造了一组非常有用的概念,对上述的进展予以说明。人类的每一个社会(包括可能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在允许给它的成员一些选择机会的同时,其他的选择机会则被具有理所当然性的行动程序预先规制。其中,盖伦把选择机会被允许的生活领域称为“前台”(foreground),选择机会被预先规制的领域称为“后台”(background)。两个领域皆具有人类学上的必要性。一个仅由“前台”构成、每一个问题都属于个体选择事情的社会不能够长久维持自身,势必会陷入混乱。每一次碰面,人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交往的基本规则。例如在两